

·学者对谈·

# 漫谈社会学和社会发展

林南 马戎

对谈者:林南,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美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时间:2002年5月28日

地点:北京

主持人(以下简称主):林老师,先有一个问题问您,您这次来中国感觉怎么样?

林南(以下简称林):实际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回来一趟,这次是到南京大学参加他们的百年校庆,跟一些学者可能有更广泛的接触,而且借这个机会到苏南去跑了一下。在北京也接触到一些社会学家,市面上看了看,出去跑跑。中国大陆总的来讲跟台湾还有一些差距,但是看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个速度很快就会超过台湾。交通的建设,网络的改善,手机的使用,都在以很惊人的速度往前走。当然,我说的是东南沿海的情况,可能比较片面。但是我到武汉,到四川,觉得也在改变,变得很快,如果一直变下去,中国很快不能说是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二流水准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在某些程度上我想可能有一个跳跃的前进,比如高科技的发展,我觉得很快就会跟他们接上去。这是我一般的感受。

主:马老师在中国做了很多社区发展研究,包括乡镇企业、乡镇组织、农村教育等方面的实地调查研究,也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当地民族与汉人、汉区之间的关系研究。从您个人研究的角度,从国内学者的角度,看中国这些年来的变化,您有什么感觉?

马戎(以下简称马):这些年我也经常去沿海地区,有时是去开会,有时是开展调查。从这些年的观察来看,沿海地区确实发展得非常快,苏南那个地区,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再是农村了。但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在急剧扩大,这不仅仅是个科技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包括在人们观念上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上也是如此。沿海很多地方已经跟港台、甚至跟欧美都在迅速接近,包括年轻人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都在迅速地向西方的一些观念、一些标准靠近。

但是在西部一些地区,像西北穆斯林聚居的一些地区,可能一些传统的文化观念、社会组织、社会网络相对还是根深蒂固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确定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我想是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是从经济上扩大内需,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建材、能源各方面产品的国内市场,为东部沿海的持续发展创造市场;另一方面是想把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搞上去,为西部将来的发展打一个基础,希望东西部的差距不要继续扩大。

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觉得政府投资是必要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好事,但是如果其他方面的政策没有及时跟上去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现在西部投资在迅速增加,达到了很大的规模。根据中央电视台节目的介绍,2002年在西部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达到3千多亿,交通是一千多个亿,邮电通讯是一千多个亿,水利设施是一千多亿。这样巨大的投资带来了几个后果,一是当地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二是必然带来大量劳动力的转移。当地的劳动力无论从数量上和技能上都不能满足这样一个开发规模的要求,随着这些项目的招标与实施,必然导致大量的劳动力的流动,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甚至普通劳动者从沿海到西部,从中部到西部的转移。

这些随着项目和其他就业机会从沿海和中部来到西部的汉族人口,可能会在当地城镇人口中占据

很大一个部分,作为汉族来说,他们的语言宗教、传统文化、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和当地的维族、藏族差别比较大,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对于因为文化差异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产生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决策者,还是社会学的研究者都是必须加以关注的。因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9%,但是我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占中国陆地领土面积的64%,这个地域范围非常大。所以如果我们处理得不是很周到,损害了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占用了当地的资源,就会出现问題。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创造一个机会,让当地少数民族的普通民众对于外来的文化和人员能够逐渐地理解和接受,要认识到西部开发需要这些在素质和技能方面为西部所缺少的劳动者,他们来到西部,会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为西部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希望能够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和向前看的视野来完成这样一种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我觉得这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作为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一方面非常支持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外觉得有很多后续的研究工作要做,要使得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推动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而不是引发文化和就业方面的冲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21世纪中真正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腾飞。

主:您的谈话涉及到几个很基本的问题,包括政府和学者都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面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您讲的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文化问题,不管是摩擦意义上的,还是整合和融合意义上的都显得比原来更重要了。我想问林老师,在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原来我们考虑经济指标比较多,实际上在社区发展中还有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我们讲的社会资源(包括人的资源),然后还有社会关系资源。这些很可能不是经济的,而是社会的,在林老师的研究中是不是涉及到?

林: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到,我刚才听马教授讲了西部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我对中国的西部不是很了解,我只去过一次新疆,所以不能够做出具体的评论。但是我可以对美国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在社会这个层次上作一个介绍。也许可以让国内的学者做一个对比吧。美国的少数民族在社会学看来有几个基本问题:一个是他们的社会圈子同质性很强,由于语言、文化和各种生活习惯的关系,他们交游的对象一般都是和他同等类型的人。白人跟白人交往,黑人和黑人之间比较容易相处,讲西班牙语和讲西班牙语的相处,这就形成了社会网的基本性质,使很多物质和文化的交流产生了很大的障碍。因此,我们现在说美国白人基本占有了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加上社会上互相交往的运作,很自然地就变成了一种权益的再生产,不但一代人,而且一代一代人地传下去。那么少数民族老是觉得被排斥在外面。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差距也是越来越大。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网的差异,男女的差异很快就追上来,过去上网男的多,女的少,现在女的基本超过男的了,因为男女不是一个种族问题,一个家庭的组成有男有女,有夫有妻,所以男的虽然在技术上有一个占先的地位,但是很快女性就追上来了,而且现在网上很知道女性需要什么,所以什么购物中心、健康信息、减肥服务等,使得女性能利用就利用上。但是,很有趣的是,种族之间并没有出现这种变化。黑人使用网络,甚至使用网上互动的程序都越来越少,差距在拉大。刚才马教授讲的可能有一点隐忧,就是我们有了一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政策,但是如果沒有社会这方面的考虑的话,很可能反而会把距离加大。

美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它利用团体和基金会的方式,使少数民族成员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技术的训练或电脑的培训,使他们从小在一个贫困的环境中也能够接触到这些东西,看看将来是不是可以突破这种界线。那么回到讲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我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几点可能是需要注意的。在一个基本上很隔阂的社会里面,你如果突然间冲进来的话,因为来自外界的力量会很大,不管是资源、能力、技术、教育,如果都是强有力的进入,就会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既有的文化和社会运作的秩序形成冲击。我们讲,每一个文化都是有其层次的,它的运作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的时候没有顾及到那些人在当地的运作方式,很快就会变成有两个不同文化相互隔膜的感受,而且去的外地人当中,刚才马教授讲,也不都是高科技的人才,也去了很多工人,以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教育程度并不是能够感受到应当怎么样去和当地人很公平很正常地运作。这些问题我觉得在

社会学里面应该积极地讨论,然后也许可以让政府部门做一个比较早的准备,免得到时候发生很多不好的后果。我想有很多很多问题是我们社会学家可以着手做的。

主:至少可以这么说,原来我们在发展问题上考虑经济指标比较多,比如那时候讲“四化”,基本上是科学、技术等。后来慢慢地,在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对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像我们面临养老问题、分配体系问题,现在逐渐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如果要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话,那么就不能抛开社会。我们在其他的研究里面都会感受到这个问题。如果考虑到社会的话,制度改革仍然是经济改革,在您的研究中,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些考虑呢?比如说制度创新,或者就像林老师在讲课时讲的,它已经是属于社会和制度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勾联。那么在您的研究中会不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马:因为中国是一个在各方面体制迅速改革变化的国家,所有的领域和专题研究都不能回避这一点。林教授这次到国内的讲座,主题是讲社会资本。我知道林教授去年出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书名就是《Social Capital》。那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您讲得很简略,您谈到政治资本是和权力相关,经济资本是和金钱相关,和 capital 相关,社会资本和网络和人际关系相关。虽然这书我还没有直接看到,但是我觉得从您的介绍中,它是试图对社会的人际关系在基本理论层面上树立出一个理解与分析的系统,这样的研究在华人社会学界还是绝无仅有的。

再谈到我国的少数民族问题,解放以来政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各个方面,以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对少数民族进行优待,从区域自治制度来看,直接把民族跟地域联系了起来,同时对这些地方政府中干部任命的族属也有规定。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政府在各项工作包括招工、入学、计划生育和干部(官员)选拔上都有一系列相当明确的政策与规定。对于这样一种对待少数民族成员的优惠政策,您把它算作哪一种资本?

林:如果从政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政治资本。因为它基本上是从上面下来的,政策的拟定,我想当时肯定会有少数民族的参加。但是当作一个政策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个由上到下的趋势。我想在刚开始的时候,对一个弱势群体,政府可能只能这样做。因为弱势群体自己并不能发挥什么力量。从我们研究“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来讲,一个就是所谓结构的因素,这个结构的因素包括制造很好的大环境,就是刚才您说的如果我们能够在很多政策上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参加,使他有一些主体性,或者在政治结构中有一些位置的安排。这是很重要的。

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让他们有一个自发自动的东西。这不是单单一个政策就可以解决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研究少数民族,都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给他好的待遇,到后来,他的心情很重要,他的看法很重要。而且他的看法他的心情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群体的问题。社会是一个网络,从而他们自己的感受变成一个整体性的感受。他这个感受是不是和你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目标吻合,或者说与你理想中的目标吻合,这不见得。不管弱势群体,还是少数民族也好,他总是有一个被多数围绕着、被压迫的感觉。这种心情会在社会这个层次持续下去。我想研究社会资本很重要的就是研究他们的“自发”是怎么产生的,尤其是在一个处在被隔离的、低层面的情况下。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工作的性质,包括技术方面都有一种被蔑视的感觉,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同质化的很坚强的网络。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网络和我们接上,这很重要。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中,“自动自发”中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感觉,可以接触到,可以利用到外界来的资源。在西部开发中,会有很多的资源进入,而资源进入以后,很重要的就是使他们感觉他可以享受这些资源。不是说这个地区可以享受到这个资源,而是这个人群可以享受到这个资源,而且使他们能够比较主动地运用这些资源。所以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或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怎么样调配很重要。因为不是说我给你这个地方很多资源,你应该就可以很高兴了,心情很愉快,不是的。因为人总是追求一个效果,我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我有发言权。少数民族与外来人之间结成的网络关系,就是我们说的桥梁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就国内的少数民族研究而言,民族之间的社会关系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研究。

马：刚才林先生谈到两点，一个从社会制度上来说，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属于政治资本，但是在中国整体上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实际上政治资本在下降，靠行政来管理、约束、赋予资源分配的力量都在下降，市场的运作在上升。这样一来，少数民族原来获得的政府赋予他们的政治资本（优惠政策）的效度在下降，而他们过去被这种政策所掩盖的客观上的竞争能力上的弱势在凸显出来。

例如香港的商人到新疆来投资办企业，他不会考虑什么优惠政策，他招收工作人员的标准就看谁能够把事情做得最好，最有效率，他和谁沟通最方便，这样他就很可能雇佣来自沿海地区的人，而不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这样，随着西部地区市场经济和就业市场机制的发展，少数民族原来所拥有的政策资本在下降，而不得不面对更多市场的因素。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您刚才谈到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我想我们的社会资本的构建可能有几种途径。一个是人为的主动地去认识，比如我上学，我在学校结识了同学，我到单位工作，认识我的同事，或者我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一些朋友的朋友，这样建立一个社会网络，变成我的信息、资源或其他方面的支持。但你会发现，同样面对两个人，你采取这样一种主动的态度对其中一个人可能很有效，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基本上无效。这里面就有一个认同的量的问题。比如这个人和我在文化背景、民族、宗教方面是相同的，我的主观努力就会比较容易奏效，因为我们的交往具有文化基础上的认同。而对另一个人，如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比如两人之间的语言可能并不很能沟通，尽管主观上想去构建社会网络，但效果不一样。

回到您刚才谈到的那个问题，在我国不同的民族之间，可能还各自具有不同的宗教背景，中国有 10 个民族信伊斯兰教，我们会发现在改革开放后，这些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社会网络的建立方面急剧弱化。原因其实很简单。过去我们的认同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在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大前提。马克思说，阶级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民族。既然大家都是各民族受苦的穷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共同反对压迫我们的富人。所以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文化革命”期间，在民族之间有相互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经济基础。土地改革以后，各族的农民分了田，分了地，他们感激共产党，感激毛主席，那时各族民众之间的认同具有这样一个基础。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原来的宗教、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上升，这方面认同的程度明显加强，可能会不利于族群之间社会资本的建立和社会网络的构建。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林：您刚才讲的跟我在沿海看到的有相似之处，至少我们看到，相对来讲，经济动力和社会动力慢慢在提升。网络的建构都是经济的动力，再加上当地以家族为主的力量，从而另外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很稳固，很普遍的。所以政治动力在相对下降，我觉得这个和你讲的很契合。但是也碰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了最后的时候，不论是经济制度，还是社会秩序，还是需要政治力量的，所以政治不是干扰它，而是使它的运作正常化，使市场的游戏规则能够维持住，使大家都能够遵守这个市场规则，不能让人家利用市场空间采用很不正常的运作方法，比如说侵犯其他人的利益。研究社会学，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要提醒政府或其他执行政策的人，要注意很多不同的因素，政策不是要压制，而是要使市场运行很公正、很公平，使其按照游戏规则来良性运行。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我想接着往下说，就是您说的社会和文化的力量在兴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看全球的话，都涉及到亨廷顿讲的所谓的文化或者文明间的冲击。实际上，就是这个转向。这个转向很快。比如我们在 90 年代看到的是整个一个全球化，全球化的基础是什么？是个经济的基础，从经济资本来看全球化。但是没想到，从“9.11”以来，大家发现，整个全球的运作中，文化和社会的力量往往也超过经济可以运作的力量。所以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早注意的话，纯粹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解决的话，那很快就可能出现一个很可悲的结局。

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和美国（或西方）就一定要冲突，但是政治是很重要的。举例来说，布什在“9.11 事件”之后，用了一个很不幸的词“Crusade”（应可译作“救世军”或“十字军”——林南注），这个词的意思是解除恐怖分子的问题。但从历史文化上讲，这个词是基督教对回教的宣战（圣战）。几百年来，基督教想把耶路撒冷从回教手上弄过来，这就变成一个文化和宗教问题。他在讲的时候，下面的人就发

现他讲错了,所以以后就没有再讲了。但是,这个词提出以后,马上就传遍了回教世界,让人想起再度以十字军东征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反应是很强烈的。我想我们在西部开发的时候要特别特别小心,就是说对既有的文化和社会的基础应当怎样去维持,而不要破坏它,不要给他们的印象是,我们来了以后要以我们的方式进行,以我们的政策进行。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出现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即我按我的做法为什么不行,而非要用你的方式做?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但是我很奇怪,比如美国总统布什这样的人都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很多政治家还是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醒。不管他再聪明,力量再大,他有时候会想不到这些看起来很小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核心的问题,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反击,很强烈的反击。但是微妙的是,怎么办?

我想起布劳教授曾讲过的一个很简单的理论,就是说两个人群在交往的时候,人口多的人群绝对是占优势。比如说,少数民族有10人,而多数民族有100人,每个人有10次交往机会,那么,少数民族交往的多是多数民族,多数民族交往还是多数民族,那么少数民族就有被包围的感觉,怎样调节这种问题?不是说把他们的交往隔断,问题是怎样把他们数字上的劣势变成质上的优势。所谓质的意思,我是指资源的交换,比如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能使当地人感受到的概念,就是我们进来不是把你的资源挖走,不但资源不挖走,而且我们通过开发建设,还把外面的资源运到里面来,给他一个外来的、更好的、更丰富的资源环境。

因此在政策上,一开始就要讲清楚。所以我那天也提到了美国西部开发的例子。开发不是把你的金矿和油一起挖走,而是因为开发了,从而使外部的资源可以进得来。这样的话整个地区就会发展,美国的西部现在基本上可以与东部相抗衡,当然这经过了很长时间。美国当然采取了市场的机制,但是有一个政策在后面引导它,就是我们怎么样用市场的力量把西部开发起来。因为西部不仅仅是印第安人的力量,而且面对的是俄国从阿拉斯加过来的力量,也有拉美的力量和法国的力量。怎样使当地人变成“美国人”?什么洛杉矶、圣弗朗西斯科等等都是西班牙语的名字,怎样使他们能对美国具有一种认同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他们以资源的保障,甚至给他更丰富的资源,从而加强他们的认同。

马:刚才林先生说的实际上是很核心的问题,在西部开发中,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他的语言是少数语言,他的教育发展落后于沿海的汉族地区,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方面在竞争中都处于劣势。开发西部的关键是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开发的结果是什么,要让少数民族在当地的资源分配得到应有的份额,让他感到一种平等和安全。这就涉及到参与的问题,由于现在有些经济资源不再是一种行政机制的分配,必须要通过一种市场机制的分配,所以问题就成为当地的少数民族能不能充分地参与到西部开发里来,当那些外部公司进来以后,他能不能被雇佣,能不能被雇佣到比较好的位置,这样在将来资源分配的时候他能够得到自己的一份。

过去我们的分配,按您说的是一种政治资本,是一种权力分配和行政安排。但是我们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又必须要引进市场机制,这样既不可能靠原来的行政安排,外资、港澳台资不会接受,原来的行政机制也不可能继续运作,而我们又不可能完全按照香港、台湾那样完全的市场机制来运作,因为完全市场运作的话,本地的劳动力包括大学毕业生和知识分子都可能被挤出当地劳动力市场。

我考虑了一个两方面兼顾的方法。在劳动力的培养上我采用行政和政策的方法,加强在学校里的投入,甚至可以适当延长学制,等少数民族学生取得必要的竞争能力之后,让他们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去参加竞争,这时再采用市场机制。我想这可能是惟一的方法。这就必须要对我们现有的少数民族教育体制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改革,发展双语教育,强化汉语教学,如果他汉语能力差,他怎么和外来的企业管理层人员、技术人员沟通?同时还要发展英语教育,这样使他们在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各门学科上的成绩和实际能力能够与汉族学生进行竞争。这方面,既不能完全按照过去行政的方法,在毕业时强行分配,用人必须接受,毕业生带指标工资下去,所以当时国有企业可以接受他们,因为你干不干活无所谓,反正当时是计划经济,工资由国家下拨,不用考虑生产成本。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也不能完全让工厂主、企业主来直接随意挑工人,因为在这样一种形式下,如果一些具体事例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带来社

会稳定的问题,所以恐怕要研究一些相应的调整方法。要介绍政府的民族政策,政府劳动部门要参与劳动力市场上的协调与沟通,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免税等)鼓励外来企业主雇佣当地少数民族劳动者。

另外一个问题,那天听您的讲座受到的启发很大,长期以来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能够建立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您刚刚参加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在1998年北京百年校庆时我们举办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费孝通先生定的题目,叫“文化自觉与跨文化交流”,当时人们就看到了现在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存在着问题。我们一直在想,不同的文化,比如基督教、佛教、儒家、伊斯兰教,在它们的文化沟通当中怎样能够建立一种新的、更宽广的人类文明(不是说一个具体文明分支)的融合,但是我们一直找不到对这种融合(或隔阂)进行测量或判断的方法,我们能够判断出来,过了5年之后,过了10年之后,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沟通得更好了?还是隔阂更深了?您刚才谈到的社会网络,我觉得倒是一个可以在研究中加以量化的方法。比如,在新疆,在西藏,在拉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调查,现在与过去相比,各族居民在居住方面是更混杂了,还是更分离了。在平时日常的社会交往方面,比如说,在新疆大学过去维族过节的时候请汉族同事去,现在如果不再请汉族去了,这是否可以说是一个倒退?其实,我们可以从您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量化的角度来开展一个具体地点、一个社区当中跨文化沟通变迁的研究。

林:我想接着这个问题来谈,我们现在研究社会资本是个量化的问题。社会资本涉及的面很广,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社会资本是不是信任,是不是一个义务团体的问题,那么我指的社会资本坚持用社会网络概念来讲,就是因为它量化的基础特别的强。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有个新的方法,叫做定位法,是指给出十几种不同的职业,然后问调查对象认不认识,比如说你认不认识一个小学老师、律师或警察。不认识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经过配偶(爱人)来认识。这样很简单就可以区分这个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是黑人、白人,还是西班牙语系的,这样运用到中国的话就是具体的民族了,是少数民族的,还是多数民族的。从这个表格中你很快可以看出来他所可以接触到的是哪一类的人物,因为我们的职业的选择是一个社会的选样(抽样),就是社会上比较普通的,一般人可以接触到的职业。而且可以发现在这个网络中,他们接触到的人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我们当然很希望看到异质化程度(高),因为这样资源运用比较灵活。也许我们会发现多数民族异质程度强,而少数民族异质化程度比较弱。这在研究中是可能得出的结论,在方法中是有这样一个优势。

另外一个问题您提到的也很重要,就是在一个社交场合中,个人是不是有不同的邀请?我最近在研究喜庆(喜宴)的问题。请客时请了哪些人,一般在请来的客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宾,让他致辞,多半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可以看他是哪一种文化、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一种政治资本的代表。如果是文化融合得很好的时候,他在邀请时应该有不同的选择。也可以考察是不是隔阂了,是不是某一个民族请的主宾一定是那个民族的。从很简单的日常生活中,从常态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社会网是怎么扩展的,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涉及到不同性质的人群在里面。我想这些方法在将来的研究中也也许可以加以利用。

马:原来我们也做过一些民族关系的研究,首先是关于居住格局的调查,我们在五个自治区的首府城市都做过,了解街区居民的民族构成,调查当地不同民族成员的邻居当中有多少是本族或其他民族,发表过一组文章。其次是开展过交友的分析,就是说在平时的交往当中交往较多的朋友圈子的民族构成,比如说在蒙汉杂居的地方,询问被访者他的朋友中几个是蒙族或其他民族,可以得到一个比例,分析影响这一比例变化的自变量。同时,我们也借鉴了美国学者在族群关系方面的研究,调查了不同地区的族际通婚(intermarriage),我们也做过城乡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果把这些研究放在一起,做一种社会网的分析,在社会网的不同层面和不同的方向上整体上再概括化一下,可能会更好。总之,听您的讲座,我觉得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这样一个理论对我们研究族际交往关系的量化方面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工具。

林:你刚才讲的这几个研究,我觉得都做得很好。社会资本从理论上讲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马先生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我们已经做得很久了,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呢,就是一个资

本的问题。这就是说在通婚或者是居住的条件下,你所碰到的人他们所代表的资源是什么?这很重要。比如说在美国,在有的地方可能是黑人和西班牙语系的住在一起,这并没有代表他们资源的上升,因为两边都是穷人。虽然可能看到有一个mixture的意义在,但实际上并不代表他们资源的上升或接触到好的资源。资本的意义就在这里,即除了接触面之外,后面隐含的可以利用的资源是什么。这样加入资本以后,对民族关系的变化就会看得比较完整。

马:所以我们以前看的只是注重族属,没有看到他们的社会位置。你刚才谈的,我觉得启发很大,我们以后在研究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时,就可以注意这里面是否标志着社会资源的提高,社会资本的增长。

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不仅在美国社会学界发生影响,也对经济学界发生影响。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9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阶段,发现很多所谓的经济模式用在第三世界或者是发展中地区已经不适合了。它开始尝试其他的途径,结果就接触到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开始的时候很可惜,他们当时以为社会资本概念就是一个参与的问题。比如在美国,你是不是参与一些义务的教会的工作、献血等等。结果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很直接地用到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在印度做实验,他们把当地贫困的居民组织起来,以形成一个自发性的团体。这个问题和我们刚才讲的是同样的问题,他只想到其一,没想到其二,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是穷困的人在一起,他们再怎么努力,他的资源还是有限。社会网的概念就是一定要让这个群体接触到外界质量比较高的资源,这样才有利。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世界银行这样滥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把社会资本的名誉都搞坏了。因为他们老是用那种模式,没有想到后面资本的含义。所以现在 we 有一点担心的就是,他们这样的运用方法可能做出来没有效果,比如在印度的一个小村子,让大家组织起来,结果组织了半天,还是没有什么可以运用的东西。这也涉及到网的稀疏,疏的好处在于可以出去。这些问题在你们的研究里可能已经都有了,还有网的密度的问题,后面代表的资源的问题,如果结合社会资本来做就可能更精彩了。

马:我有一个小例子向您请教。在美国,种族通婚有一个很普遍的模式,就是“上嫁”(marrying up),比如很成功的地位很高的黑人男子娶一个地位偏低的白人女子。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女子是“上嫁”,从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上讲她属于稍微低一点的。黑人男子娶地位比较低的白人女子是不是也是通过这一途径获得某一种社会资本?这可能使他更容易得到白人社会(主流社会)的某种认同。这可能是一种交换,白人女子得到的是经济资本,马上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黑人男子得到社会资本,我觉得这是一种重要的双向的交换。

林:这是一个交换。我们知道,在一般的民族里面同质性很强,他们的关系都是在族群里面发展。通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交换。比如说,美国很多黑人职业球员常跟白人女孩在一起,最近,闹得很厉害的有一个打高尔夫的球星,“老虎”(Tiger Woods),他所有的女朋友都是白人,黑人就提出来抗议,说他为什么不跟黑人女孩子交往。Tiger Woods的解释是我根本不是黑人,他说他不但有白人血统,还有泰国人血统。他甚至还有中国人的血统。他的母亲还是泰国的华裔。所以这样讲起来,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你刚才讲的资源的交换。女方处于弱势的时候,她就可以通过婚姻触及到那些资源。男方也是这样,他可以通过他的夫人进入白人圈子,尽管可能地位较低,但他接触到的资源可能很大。我希望做一个很有趣的社会资本调查,针对夫妇的。夫妇之间的婚姻实际上是两个社会网的桥梁,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活动的圈子,结婚的时候,这两个圈子就重叠了。这两个人作桥梁。但基本上,在一个普通社会中,男性作桥梁的可能性比女性大,因为女性的社交圈比男性小,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我不清楚。西方的女性是不工作的,所以她的生活圈子比较小,比如附近邻居,一些太太们在一起。通过丈夫的关系接触到比较多的网络,比如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喜宴等等。问题在于,桥梁搭得好的时候,婚姻进行得好的时候,资源很丰富;如果桥梁搭得不好,夫妇两个感情破裂,这对两个人的影响就不一样。这时,丈夫的网络已经铺得很广了,桥梁虽然断了,他可能马上通过其他途径可以补上。但是处于弱势的一方,需要这个桥梁的一方,如果断了,影响很大。所以我研究医药社会学就是这个意思,发现跟社会网

有关系，一下子脱节的话，马上身心都会受影响。女性的弱势是有这个问题的，这是个社会性很强的问题。

主：你们都涉及到社会发展中很基本的很重要的问题，例如社会网、社会关系等。

林：社会关系一直在运作，只是我们没有检验到，或者没有计量到。在研究中国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怎样把社会性或者社会关系进行量化，而且找到跟政治、经济之间的重要关联。如果能在研究中把这些关系显示出来，也许可能比在西方看得更全面一点，这还需要国内的社会学者的努力。

马：现代化和现代性是多年来谈论的一个话题，而且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有些学者说，实际上现在的全球化是西方化。现代性、现代化无论从标准、理念到工具性都是来自于欧美的社会发展，包括我们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也是来自于欧美社会。所以又有人在讲，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并行的。毕竟这些年来，尤其是伊斯兰教国家，对欧化、西化做出了一种反应。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能不能（把全球化）分成不同的层次，某些是属于工具层面，在这些方面会普遍化甚至标准化，而在另外一些层面，全球化实际上是推不动的。

全球化在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很有效，也有利于国际沟通，但在很多基本观念的层面上，这个世界可能还是会保持多元化。另外在我们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中，可能还要对各个具有不同传统的文化的根源、发展、现在的生命力和表现方式作出一些归纳。谈到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各国学者都会根据本国的研究，包括对本国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特点的分析，对网络建构的渠道、网络运作和表现形式的研究，可能都会从这些研究中总结出各自的文化特点，从而使得现代化和现代性既有共性的地方，也有各国的本土特点。按照费先生讲的就是“多元一体”，既有多元的地方，也有一体的地方，既和谐又保持各自的特色。

林：最近西方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现代化”这个概念进行修正了，承认了“多元现代化”这样一个概念。我举一个实际例子来验证多元现代化的问题。在土耳其，凯末尔革命成功后，基本上认为政体及其运作和宗教要完全分离，这样才能成功。土耳其是我们看到的回教国家中做得比较成功的，政治的运作、经济的运作、社会的运作可以与宗教分离，可以世俗化，这在回教国家中是比较少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中有一个规定，妇女进校园不许戴头纱，而头纱当然是回教妇女很习俗化的一个装饰。学校（教育团体）是世俗化的一个阵地，军队也是一样，不许把宗教的东西带进来。最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一个医学院的女学生就坚持要戴头纱进来，学校就说，你再戴头纱进来，我们就开除你。你不但犯了校规，而且违反了国家的规定。但这个女学生说，你干扰我个人权益，我戴头纱是我自己决定的，你怎么可以决定不许戴。她的行为得到了其他一些女学生和校外妇女的支持，最后组织成了一个妇女运动，要求她们到校园里来有戴头纱的自由。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当然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不知道。这个女学生的父亲还是医学院的教授。这个有趣的故事给我的一个启示是，它是一个现代化的妇女运动，这些妇女都受过高等教育，但她们要求的是什么？是一个传统的恢复，两者结合得非常好，对她们而言毫无冲突。她们说，这是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选择，你怎么可以干涉我。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你不能干涉我，你应该让我选择。这给我很大的启发，现代化真的是多元的，不一定要坚持把过去的一齐都打破。我们研究社会网的问题，包括社会运动，各种因素怎么纠结在一起的。我们不一定要走单线发展的路子，人们对其他掺进来的因素有一定的需求，如果我们能够容纳这些因素，社会交易上就能比较良性。

录音整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郑广怀

责任编辑：谭 深